



曲 枫 | 主编

唐 戈 | 本期特约主编

[德] 迈克·克努佩尔 | 副主编

赵立霞 | 执行主编

北冰洋研究

第七辑



Journal of Arctic Studies

上海三联书店



曲 枫 | 主编

唐 戈 | 本期特约主编

[德] 迈克·克努佩尔 | 副主编

赵立霞 | 执行主编

北冰洋研究

第七辑



Journal of Arctic Studies

 上海三联书店

目 录

卷首语

呼伦贝尔的特点和国际化	唐 戈 /1
Preface	Michael Knüppel / 9

呼伦贝尔与区域研究

西北满洲——根据沿途考察资料所作的地理学概述	[俄] 希罗科戈罗娃 (张 松 时 妍译) /3
西北“满洲”和使鹿通古斯——于 1930 年 4 月 7 日晚间学会会议上宣读	[英] E. J. 林德格尔 (王 佳译) /15
北极圈民族和文化研究的定位问题之拙见	白 兰 /38
呼伦贝尔：区域概念与区域研究的构想	唐 戈 /46
本体论、族群互动与小民族——试论作为方法的鄂伦春	张雨男 /58

历史与文化变迁

搬迁：文化演变的枢纽——近半个多世纪使鹿鄂温克生活历程	何 群 /71
呼伦贝尔地区八旗制度的建立及传统社会的结构性变迁	王 伟 /87
略论乾隆朝布特哈八旗的贡貂制度	姜永军 王学勤 /98

经济与生计方式

通古斯鄂温克人“定居游牧”生产模式的形成与现状	李·蒙赫达赉 /111
鄂温克族自治旗文旅产业创新发展研究	刘晓春 乌日乌特 /124
场景理论视角下的牧区小镇经济发展——以阿木古朗镇特色产业为例	唯 日 /136

2 北冰洋研究（第七辑）

农牧经纪人——呼伦贝尔草原“老客”研究 殷汝帅 /145

边界研究

俄中边境锡尼河布里亚特传统文化 [俄] 米哈廖夫·
马克西姆·谢尔盖耶维奇（齐山德译）/161

中俄口岸“打包商”：一个迁移群体的社会网络与商业实践
——基于满洲里的田野调查 孙晓晨 /171

民间文本与宗教传统

岩画与通古斯人的宗教神话传统
..... [俄] A.И. 扎比亚科（王俊铮译）/185

中国三河流域俄罗斯族的旁注民俗文本——艺术民俗志资料
..... [俄] 扎比亚科·安娜·安娜托利耶夫娜（王宇琦译）/195

内蒙古三河流域俄罗斯族民间文化——“旧”歌概况 张如阳 /213

前沿观察

在过渡边疆重建当地社区：库玛尔路的管理和社会组织——从1900年到1940年
..... [美] 金由美 曾健欣 /228

书评

俄罗斯“遗失的文化天堂”——评柯廖斯的《三河地区的俄罗斯文化
——民间文学与传统文化论集》..... 唐戈 梁喆 /299

学术动态

黑龙江省鄂温克族研究会 涂亚君 /309

征稿启事

《北冰洋研究》征稿启事 / 314

Call for Submissions: *Journal of Arctic Studies* / 315

CONTENTS

Preface

- Features and Internationalisation of Hulun Buir Tang Ge/ 1
Preface Michael Knüppel/ 9

Hulun Buir and Regional Studies

- Northwest Manchuria — Geographical Overview Based on the Data along the
Way Елизавета Николаевна Широкогорова
(Translated by Zhang Song & Shi Yan) / 3
Northwest “Manchuria” and the Lulu Tunguska—Read at the Evening Meeting
of the Society on April 7, 1930
Ethel John Lindgren (Translated by Wang Jia) / 15
The Opinion on the Positioning of Arctic Circle Ethnic and Cultural Studies
..... Bai Lan / 38
Hulunbuir: Concept of Region and Conception of Region Study ... Tang Ge / 46
Ontology, Ethnic Interaction and Small Ethnic Group: Orochen as Method
..... Zhang Yunan / 58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hanges

- Relocation: the Hub of Cultural Evolution — The Way of Life of Reindeer
Ewenki in the Recent Half Century He Qun / 71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Eight Banners System and the Structural Change of
the Traditional Society in Hulunbuir Area Wang Wei / 87
On the Tribute Mink System of Butha Eight Banners during Qing Dynasty
..... Jiang Yongjun & Wang Xueqin / 98

Economy and Ways of Livelihood

- The Status Quo and Formation of “Settled Nomadic” Production Methods of
the Ewenki People Bo • Menghedalai / 111

4 北冰洋研究（第七辑）

- Research on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the Cultural and Tourism Industries
in Ewenki Autonomous Banner Liu Xiaochun Wuriwute / 124
-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Pastoral Tow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cene
Theory Wei Ri / 136
- Brokers between Agriculture and Animal Husbandry — Based on the Research
of Hulunbuir Grassland Cattle Dealer Yin Rushuai / 145

Boundary Crossing

- Strategies of the Shenehen Buryats in the Context of Russian-Chinese Border
..... Maxim S. Mikhalev / (Translated by Qi Shande) / 161
- “Packaging-businessman” at the Manzhouli Port—the Social Network and
Border Trade Activities of Migrant Groups Sun Xiaochen / 171

Folk Texts and Religious Traditions

- Petroglyphs and the Religious Mythological Tradition of the Tungus
..... Andrey P. Zabiako (Translated by Wang Junzheng) / 185
- Literary Ethnography: the Problem of Explication from Marginal Folklore Texts
of Russian Descendants in the Sanhe
A. Zabiako (Translated by Wang Yuqi) / 195
- Russian Folk Culture in Trekhrechiye (Three Rivers, Sanhe), Inner Mongolia
— Overview of “Old” Songs Zhang Ruyang / 213

Frontier Observation

- Reconstructing Local Communities in Transitional Borderlands: Governance
and Social Organization of the Kumar Route, 1900—1940
Loretta E. Kim & Monica Kin-ian Chang / 228

Book Review

- Russia’s “Lost Cultural Paradise” Comments on Kolyos’s “Russian Culture in
the Sanhe Region: A Collection of Folk Literature and Traditional Culture”
..... Tang Ge & Liang Zhe / 299

Academic Events

- Ewenki Research Association in Heilongjiang Province Tu Yajun / 309

Call for Submissions

- Call for Submissions: *Journal of Arctic Studies* (Chinese) /314
- Call for Submissions: *Journal of Arctic Studies* /315

历史与文化变迁

呼伦贝尔地区八旗制度的建立 及传统社会的结构性变迁*

王 伟

摘要：本文从清代呼伦贝尔地区八旗制度的建立入手，讨论近现代以来该地区的氏族组织变迁，并以此管窥社会结构的变化对当地文化造成的影响。首先，借助史料分析清初呼伦贝尔地区世袭佐领制以及八旗制度的设立对当地影响；其次，探讨宗法伦理思想渗透到索伦八旗后，如何促进其社会组织结构的变化；最后，分析传统社会结构的转变对索伦旗人传统文化产生的影响。

关键词：呼伦贝尔地区 社会结构 宗法伦理思想 萨满文化

作者简介：王伟，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副编审。

清代呼伦贝尔地区主要居住着索伦、锡伯、达斡尔和蒙古等族人（其中“索伦”主要指今鄂温克和鄂伦春人），清初征服索伦部族之后，雍正十年（1732），清政府派遣索伦、达斡尔、鄂伦春、巴尔虎等人驻扎今呼伦贝尔地区戍边，并编制为“索伦左右两翼八旗”（简称索伦八旗）：“黑龙江将军卓尔海等奏称，据达巴哈、博尔本察等，相视呼伦贝尔附近之济拉嘛泰河口处地方辽阔，水草甚佳，树木茂盛。可以种地筑城。请拣选索伦、打虎儿、巴尔虎、鄂伦春之兵三千名，迁移其地。将伊等编为八旗。左翼自修城处至鄂罗斯交界处游牧，右翼在喀尔喀河游牧……请将达巴哈管理左翼，博尔本察管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东北亚文化圈农耕文明视阈下的中韩萨满教比较研究”（项目批准号 18BZJ052）的阶段成果。

理右翼。”（巴德玛等，1993：48）八旗制度是清代满族的基本社会制度，通过八旗制度完善了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等级制度等。在这一过程中，满族文化不断调整，发生了许多重要的变革，不仅吸纳了儒释道和藏传佛教等宗教，而且对本民族的传统萨满信仰进行了规范，宗教信仰呈现多元化趋势（孟繁勇 2012）。清朝任用汉人，设立科举制、六部两院等，使汉人的典章制度渗透到八旗中，儒家文化随之传入有清一代社会各个层面。

儒家文化的传播促进了旗人道德观念的转型，也在很多方面改变了旗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规范。建立索伦八旗之后，为了管辖索伦八旗的索伦、达斡尔、巴尔虎、鄂伦春人，满清在八旗中安插了满族人，以监视索伦八旗（包梅花 2012）。而对于索伦旗人来说，了解与接纳作为官方文化的满族文化是必然的行为。因此，满族文化全面地渗透到索伦八旗社会中，同时满人所带来的宗法伦理思想极大地影响和改变了各民族的社会组织结构，而且对当地传统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然而，这一现象尚未受到学术界应有的关注。鉴于此，本文从清代以来的史料入手，讨论近代以来呼伦贝尔地区设立八旗制度后，传统社会的结构性变迁，以及儒家宗法伦理思想与制度对当地文化的影响。

一、世袭佐领制对修纂族谱制度的推动

索伦八旗接纳儒家制度与文化的过程中，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事件，便是世袭佐领制在清代索伦人中的设立。征服索伦族之后，清政府于崇德年间逐渐将归降的索伦人编为牛录，后来又令“驻扎耕种，任其择便安居。其中有能约束众人堪为首领者，即授为牛录章京，分编牛录”。（《清太宗实录》）牛录本来是满族传统的狩猎组织，具有鲜明的血缘组织色彩。“择便安居”说明清政府设立牛录时基本尊重了索伦人原有的习惯；而以能约束众人者为首领，也是依从索伦人原有的秩序和制度。由此可以推测清政府是在索伦原有的氏族组织基础之上建立新的牛录，并任命其中德高望重者——很可能是原来的氏族长为牛录章京（即佐领）。因此归附过程中的牛录编设，使索伦人各氏族仍然基本保持了血缘聚居的氏族组织形态，各氏族的血缘群体完整性得到了最大程度的保留。又据《清世宗实录》记载，雍正六年（1728年）黑龙江将军上疏言：“八旗索伦打虎儿三十九佐领内有袭于伊等子弟者，亦有轮流补放者……所有噶那逊等十七佐领向未将他姓之人补放，请俱授为

世袭佐领，遇有缺出，即于伊等子弟内拣选补放。”由此可知，佐领一职最初分为世袭与非世袭，后来根据需要，佐领制度得到普及和发展，世袭佐领逐渐增多，同时又设立世袭三代的“云骑尉”等官职，作为清政府稳定索伦社会秩序的重要手段。

世袭佐领制的施行需要有明确的家族世系作为承袭职位的依据，这一制度促使索伦八旗吸收了汉族的修家谱制度。清初索伦八旗的社会组织构成中，血缘作为非常重要的纽带将人们联结在一起，氏族是基本的社会单位，因此索伦八旗所修立的事实上是族谱。人们编纂族谱以记载子孙的世系传承，区分成员血缘关系的亲疏远近，记录重要人物对氏族的贡献和事迹。族谱制度的确立是索伦八旗受到儒家宗法文化影响的结果。据记载，乾隆年间，墨尔根城空缺了一个公中佐领（非世袭佐领）的职位，原任佐领名叫雅启岱，他有一名曾孙叫坤都保，时任骁骑校。当时的都统傅玉便奏请坤都保继任佐领一职，并呈上雅启岱的家谱，以证实坤都保是雅启岱的直系子孙（事见《清高宗实录》）。对这一事件的记录证实，佐领制度的设立直接促成了索伦八旗人修族谱的制度，按照族谱所记载与任佐领一职者的亲疏远近承袭职位，继承人选不仅限于子孙，也包括亲兄弟。近年来，学术界对呼伦贝尔地区的族谱进行过调查，1956年组成的内蒙古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中的鄂温克族调查分组，于当年10月在呼伦贝尔盟的阿荣旗、索伦旗（即今鄂温克族自治旗）等地进行了详细的调研，研究了收集到的索伦鄂温克族谱，调查组认为族谱的编纂时间应该是在18世纪左右（内蒙古自治区编写组1986:19），大约就是佐领制开始实行的时间。在调查中发现的索伦鄂温克族谱中，年代较早的族谱修立时往往将最早的祖先上溯到追随努尔哈赤的时代甚至更早，很可能是先祖在被任命为世袭章京一职时便已开始修纂。

索伦八旗的编制以佐领制为基础，清政府将此地的索伦人和蒙古人等先后编制为索伦八旗（1932年之后索伦八旗等地改称索伦旗，今鄂温克族自治旗）和布特哈打牲八旗（以嫩江为界分东布特哈和西布特哈，今呼伦贝尔大兴安岭南部地区，扎兰屯市及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等地），具有地方行政管理和军事职能双重功能。尽管被编入八旗，但是清政府并没有拆散旗人原有的聚居方式，而是以“不分离其部族，按所居之相近，便于管束”的原则进行编设，仍以原有的氏族部落为基础（苏钦2005）。将氏族组织纳入旗制，维持了原有的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保持了社会生活不致发生大的变化，有利于社会稳定，也便于清政府对这一地区的管理。随着社会的发展，佐领制和

八旗制在一定意义上消解了原有氏族组织的部分功能。

萨满教是与血缘组织紧密联系在一起，佐领制和八旗制的建立为血缘组织提供了一种不同以往的聚居方式，即在行政制度的管理下，而非传统的部落氏族制。传统时代根据迁徙游猎等需要，氏族聚居方式是不固定的。而在行政管理下，生活方式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并为血缘组织的进一步演变埋下了伏笔。

二、哈拉-莫昆组织的确立及定居村屯的初步形成

在八旗制度的统一管理下，呼伦贝尔地区受到满汉文化的巨大影响，除了前面所提到的修族谱制度之外，在氏族组织构成方面也有明确体现。20世纪初对通古斯语族群体进行调查研究的史禄国认为北方通古斯人对氏族的理解是，同一氏族的人们起源于同一个或几个男性祖先，因此具有血缘关系和共同的名称，遵守一系列的禁忌，其中最根本的禁忌是禁止同氏族成员之间通婚，即实行族外婚制（史禄国 1985: 183）。八旗索伦人将氏族称呼为“哈拉”，并用另外一个词“莫昆”称呼氏族的分支。哈拉直译为“根”，所指代之含义与汉语的“氏族”之意大体相同，哈拉的成员是同一个人的后代。莫昆基本相当于汉语的“家族”，是从氏族中分化出来的分支。这两个词应该是从满语借用而来，哈拉-莫昆组织是满族的氏族组织形式，这种组织形式被索伦旗人借鉴，成为索伦旗人的氏族制度。

当哈拉太过庞大的时候，由于人口多，居住地分散，不太容易举行全体活动，因此某些功能便会受到影响。因此而分化，产生出莫昆。莫昆在血缘上更为接近，一个莫昆壮大之后，会形成新的哈拉，与原哈拉的社会功能相同。我们看到一些氏族名称的词尾带有“基尔（gir\jir）”，史禄国认为这是比较古老的氏族，否则是后来分化出来的新氏族（史禄国 1985: 185）。

八旗制度建立之后，索伦各族开始定居生活，不再像传统生活方式那样频繁迁徙。18世纪上半叶，布特哈地区已经建有八旗索伦村屯。据西布特哈武力斯家族成员介绍^①，他们家族保存下来的族谱所载最早的先祖曾任满清时官职，他们约在300年前由今齐齐哈尔地区迁徙到呼伦贝尔的莫力达瓦旗，从此定居下来。早期的村屯即由莫昆构成，有时一个莫昆定居下来便构成一

^① 武丽娜讲述，记录时间：2009年12月5日。

个村屯，也有两个或两个以上莫昆共同构成一个村屯。莫昆构成的村屯比汉族农业社会的村庄要小得多，每个莫昆有一名“莫昆达”，管理一般事务，以及一名萨满，管理宗教活动。莫昆达由莫昆全体选举产生，维持习惯法，必须公正无私，否则会被罢免。莫昆达有权召集本莫昆成员开会处理内部问题，而遇到莫昆内部的重大问题，必须由莫昆各户老年人组成“莫昆会议”共同裁决。如果要解决与其他莫昆之间的问题，则由佐领处理。莫昆达有权处罚犯错者，当犯有严重过错，则打开族谱，将犯罪者从族谱中开除。莫昆内男人死后，如没有儿子，其财产由莫昆内的近亲继承。每个莫昆有自己的墓地（吕光天 1982）。

由于清代呼伦贝尔地区索伦旗人过着游牧生活，相对于留在布特哈地区的索伦人的定居狩猎生活又有所不同，因此在构成村屯的方式上也有区别。1949年以前，索伦旗部分鄂温克人仍旧以氏族为单位，实行族外婚制。游牧生活中，往往几个家庭组成一个小团体，称为“尼莫尔”，意为“邻居”。这些家庭之间有血缘关系，属于一个哈拉或莫昆，从三四家到十多家不等，有共同的牧场和草场。尼莫尔的结合时间并不是固定的，有的二三年，也有的十几年（吕光天 1961）。尼莫尔是游牧索伦鄂温克的基本社会组织形式，共同游牧迁徙。每个莫昆都分化为若干个尼莫尔，住在相邻的牧场。通过选举产生莫昆达，负责处理族内日常事务，而由萨满处理宗教事务。虽然尼莫尔以血缘为纽带，但是已经是以家庭为单位。尽管尼莫尔共有牧场，然而牲畜属于各个家庭私有。

定居之后，清政府开始在呼伦贝尔地区施行学校教育，教授满汉文化，极大地影响了索伦和布特哈旗人的思想观念。康熙三十四年（1695）在布特哈地区设立学校，“黑龙江将军萨布素等疏言，墨尔根地方两翼应各立学，设教官一员。新满洲诸佐领下，每岁各选幼童一名教习书艺”。（参见《清圣祖实录》）墨尔根地方即今嫩江地区，通过学习满文、汉文，八旗索伦人更进一步接触到儒家文化。相对来说，呼伦贝尔地区的索伦八旗开设学校教育的时间比较晚。史载乾隆年间，索伦八旗之地诸族“不甚识字，又无专管官员”（《清高宗实录》），因此索伦八旗专门设有笔帖式一职，由懂满文者任职。直到光绪二十七年（1901），开办学堂之风传到索伦八旗地区，才首次修建“绰罗格日学堂”，教授满文、汉文课程，当时的汉文教师是从布特哈地区聘请而来。

需要说明的是，清统治者曾经试图阻止汉文化对旗人的影响，比如在

八旗中曾禁止汉语，“营内一概不许汉语，惟习清语或蒙古语”。（《清世宗实录》）乾隆年间，清朝统治者曾经试图阻止满族姓氏简化为汉姓，“至于姓氏，惟当对音，而竟有译为汉姓者，今既灼见其谬，岂可置之不论。”（《清高宗实录》）清廷认为汉文化会削弱八旗的战斗力和战斗力，“若令其诵读汉文，势必荒疏艺勇”（《清仁宗实录》）。无论多么不情愿，文化的传播往往是潜移默化，满清未能避免移风易俗，八旗索伦传统中也清晰地打上了汉文化烙印，并对近代以来呼伦贝尔地区萨满文化产生重大影响。

三、血缘组织的初步分化

一般而言，以儒家宗法伦理思想为核心的汉族社会宗族组织是指，有共同血缘的祖先（即相同的姓氏），拥有祠堂、祖坟和祖宗牌位以及固定的祭祀，修族谱以记录世系，设族长处理宗族的各项事宜，明确共同遵守的族规，有的宗族还有自己的族田。在宗族制度中，氏族、家族是构成社会的单元，个人受氏族、家族制度的制约。宗族制度实行家长制，有严格的等级观念。八旗制度实行以来，建立了哈拉-莫昆制度的八旗索伦与汉族的宗族制度结构已经非常接近：以共同的父系血缘始祖为祖先，祭祀祖先像，修立族谱，共有牧场、族籍地、祖坟等作为氏族存在的物质载体，设家族长（莫昆达）主持各项事宜等。哈拉-莫昆制度的一般性规定也与宗族制度的规定大同小异，例如族外婚制、族长选举制等。民国以来八旗制度解体后，呼伦贝尔地区仍在一定时期内保留了哈拉-莫昆的名称、氏族会议、族外婚制、氏族神灵、祭祀仪式等。尽管八旗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取代氏族制度的某些功能，但是氏族制度以及氏族制度下的宗法伦理思想依旧长期存在。回顾八旗制度由实行到解体以来不同民族的杂居相处，相互影响与潜移默化，呼伦贝尔地区的氏族制度、信仰习俗等方面发生了颇为深刻的变化。

首先，八旗的氏族组织发生分化，分化之后的哈拉-莫昆组织经历了从严密到松散的过程。哈拉基本丧失血缘组织实体的功能，虽然哈拉仍旧是血缘组织的一个象征符号，但是实际的功能大部分已经由莫昆来承担。事实上哈拉已经简化为姓氏，所具有的功能除了在于标志着同一姓氏的人来源于共同的父系先祖之外，仅有的规定是，同一个氏族之间不通婚，而只能在不同的氏族之间通婚。定居之后，大部分村屯的几个氏族之间往往就是相互通婚的关系。世袭官职时代的哈拉-莫昆制度达到鼎盛，而随着拥有私有财产的家

庭产生，构成莫昆的家庭成为相对独立的单位。当家庭有了自己的财产之后，由财产私有的家庭组成的血缘群体已经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氏族群体，而更接近村屯。如同八旗制度消解了氏族制度一样，村屯制度的建立，导致莫昆的作用和功能减弱。在一定意义上，村屯组织的发展促进了哈拉-莫昆制度的解体。尤其是 20 世纪左右，不同民族陆续迁到呼伦贝尔地区之后，村屯的构成更为复杂。构成村屯的不再仅是某一个或几个莫昆，也有其他氏族甚至民族。由于通婚和杂居，文化、信仰方面的相互影响加深，尽管在村屯之中，血缘仍具有重要地位，同姓之间更具有凝聚力，然而，一地多姓表明血缘关系不再占据主要地位，因此村屯已经成为地缘组织。血缘关系的亲密源于氏族制度所形成的习惯，在社会构成中起到联结人心的作用。血缘与地缘相结合，共同构成社会结构的组织基础。

其次，呼伦贝尔地区各民族原本信仰萨满教，萨满教所信奉的祖先神是祖先萨满及其神灵，而伴随宗法伦理思想而来的是对于血缘祖先的崇拜，这使原有的社会结构受到挑战。例如清代表彰有功之臣的做法是在其歿后设立祠堂，史载索伦将军海兰察病故之后，清政府为表彰他的战功，不仅谥号武壮，入昭忠祠，并且在多处建立生祠，祠内设立木牌，书写官阶，以供后人祭祀（事见《清高宗实录》）。呼伦贝尔地区的索伦人和蒙古人以游牧、游猎为主要生活方式，丧葬习俗很少有土葬，清代以来不仅开始土葬，而且建有祖坟地，即氏族墓地，在长辈去世后定期上坟祭扫。修祖坟是血缘祖先崇拜的重要内容之一，这是多民族的杂居后，文化与风俗相互影响的结果。对于父系血缘祖先的尊崇与祭祀使氏族萨满神灵不再是唯一的氏族祖先神，萨满信仰中的巫祖崇拜与血缘祖先崇拜成为社会组织中并行存在的两个平行体系。

最后，礼教观念推动了八旗人的思维方式、民风民俗的转变。八旗制度建立后，设立总管、佐领、骑校、领催等官员，并且在八旗索伦人中实行奴隶制，逐渐在各族内部形成等级制度。等级观念的形成以及由于受封、嘉奖等拥有私有财产之后，改变了原有的氏族财产公有制，出现贫富差距，这对莫昆进一步分化成家庭起了推动作用。另外，三纲五常观念在清代一度盛行，出现对妇女守节观念的提倡，迥别于原有的风俗。三纲五常是儒家宗法伦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君权、父权、夫权的确立说明儒家宗法伦理思想已经广泛渗透到呼伦贝尔地区的社会生活，强化了萨满在父系血缘家族中传承的规定。

四、从血缘到地缘的观念转变

相对而言，布特哈旗较早进入农业定居生活，但仍以莫昆为单位构成村屯定居，各莫昆有族籍地，“莫昆达”往往便是村委会主任，实际上已经类似于“宗族乡村”。林耀华认为：“宗族乡村乃是乡村的一种。宗族是家族的伸展，同一祖宗繁衍而来的子孙称为宗族，村为自然结合的地缘团体，乡乃集村而成的政治团体；今宗族乡村四字连用，乃采取血缘与地缘兼有的团体的意义，即社区的观念。”（林耀华 1937）宗族乡村背景下的个人与家族密不可分，个人生活遵从于家族制度。清代的呼伦贝尔地区虽然有一些满汉族人迁徙到这里，陆续建立村屯，也建立了少量的学校，但是这时大部分村屯还没有学校，少数民族中有些人略懂些汉语，是在与汉族接触中自学而成。虽然汉语没有普及，但是儒家文化却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普及”。编为八旗后部分八旗索伦人懂满文，很多人家中都有手抄的满文书籍，原本是汉文的诗词、经典名著等被翻译成满文在八旗索伦中流传，甚至家庭妇女都能或多或少地以满文背诵古诗词、有关家训的格言和谚语，并以此教育子女。村屯中时常开设私塾，虽然有的私塾是以满语教授学生，然而学习的内容却是三字经、千字文等。而有的汉语私塾，学习的内容更为广泛，除了三字经、弟子规外，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都是教授内容。虽然学生不甚通汉语，对所学内容一知半解，但是对经典的诵读，以及相对通俗的三字经、弟子规等还是传播了儒家伦理的思想观念和行为规范。

20 世纪 30 年代是这些村屯的一个分界线，此前的村屯是以当地少数民族为主，但是此后汉族便多了起来，至四五十年代时很多村屯便以汉族为主了。布特哈地区最后定居下来的是以狩猎为生的索伦鄂温克、鄂伦春人，直到 20 世纪中后期，他们才逐渐结束狩猎生涯，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定居，建立村庄。这些村庄即现在的猎民村，也有的地方叫猎民队。现代社会的村屯完全建立之后，莫昆的界限被打破，从而使哈拉-莫昆组织的功能逐渐消解。以猎民村为例，猎民村建立之后，成立了党支部、村委会，取代了原有哈拉-莫昆组织的功能，氏族组织不再具有原来的功能和意义，名存实亡。普遍而言，近现代以来生活方式的变化，促使氏族制度不仅在内容上而且在形式上被消解，氏族的观念越来越淡漠。社会结构中，比较普遍的是小家庭或直系亲属构成的家户团体。

血缘组织消解的一个明显标志是，基于血缘组织基础上建立的族外婚制由于哈拉-莫昆制度的解体而被打破。今鄂温克旗辉河地区的索伦鄂温克族中，同一氏族约在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有通婚的例子。人们对于氏族的概念开始淡漠之后，人们只知道他人的名字，而不再关注属于哪个氏族，因此出现结婚后才发现原来两个人出自同一个氏族的情况。族外婚制度本来是作为氏族制度的一项根本禁忌，这项禁忌的打破表明传统氏族制度的真正瓦解。需要说明的是，尽管近年来部分氏族开始重新修建族谱，不过，现代社会的氏族组织通常没有对成员权利与义务的规定，因此完全不同于传统的哈拉-莫昆组织。

总之，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呼伦贝尔地区原有的以血缘为基础的村屯逐渐成为现代意义的村庄，聚居着不同哈拉或莫昆的小分支。与此同时，血缘组织也逐渐成为地缘组织。

五、结 语

在呼伦贝尔地区少数民族社会中，正是特定的社会生活条件产生了特定的萨满信仰。涂尔干曾说：“所有的宗教按它们各自的方式来说都是真实的。尽管方式不同，所有的宗教都是对人类存在的某些特定条件的回应。”（涂尔干 1999: 3）也即，宗教实际上是对社会生活的反映。萨满教反映了社会生活，并且源于社会生活的需要。

清代呼伦贝尔地区旗人所信奉的传统萨满教依托于血缘组织，事实上传统萨满是作为家族或氏族萨满而发挥作用。因此，社会组织与结构的变化，必然对萨满信仰与习俗产生影响。依托于血缘而存在的哈拉-莫昆组织，其功能在于管理氏族或家族内部生产生活、财产分配、婚姻以及处理危机事件等。当社会或个人遇到某些困难，如狩猎无获、牲畜走失，甚至家庭纠纷等，这些困难往往难以通过诉求族长来化解，这时神圣的指引便非常重要。而萨满作为人们沟通神灵的中介，在此时便掌握着解决危机的话语权。无论萨满的行为切实与否，求助者由于受到鼓励或暗示而获得内心的安慰，对于他们来说，这种帮助是及时而有效的。正因此，以血缘为中心而建立的哈拉-莫昆制度具有牢固的凝聚力，其悠久的历史 and 生存的需要使得这种凝聚力得以增强。即便当家族制度逐步松散时，对祖先的信仰仍旧是牢固的，这使人们仍旧拥

有共同体意识，家族成员以此能够作为一个整体共同面对外部世界。由此，以血缘为纽带的家族制度在社会运转中起到重要作用。

不过在现代社会，当社会结构发生变化，地缘组织逐步取代血缘组织之后，萨满的服务对象也随之改变，不再只服务于家族，而开始服务于社区，继而服务于整个社会。并且，作为一种开放性的宗教，萨满教在与各种宗教、文化的接触中不断吸收其他宗教因素，使自身成为一种复合形态的宗教信仰。

参考文献

巴德玛，卜伶俐等编

1993 鄂温克族历史资料集. 呼和浩特：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包梅花

2012 雍正乾隆时期呼伦贝尔八旗历史研究. 博士论文. 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

林耀华

1937 从人类学的观念考察中国宗族乡村. 社会学界 9.

吕光天

1982 清末鄂温克族的社会结构. 内蒙古社会科学 5.

1961 论鄂温克族“尼莫尔”公社的性质. 新建设 9.

孟繁勇

2012 清入关前满洲宗教信仰的嬗变及其作用.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 4.

内蒙古自治区编写组

1986 鄂温克族社会历史调查.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史禄国

1985 北方通古斯社会组织.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苏钦

2005 关于清代布特哈八旗的几个问题. 黑龙江民族丛刊 2.

涂尔干

1999 宗教生活的初级形式. 林宗锦，彭守义译，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Eight Banners System and the Structural Change of the Traditional Society in Hulunbuir Area

Wang Wei

Abstract: Starting from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Eight Banners system in the Hulunbuir area in the Qing Dynasty,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changes of the organization of clans in this area since modern times, and explores the impact of the changes of social structure on the local culture. First of all, the use of historical data analysis, the hereditary Zuo Ling system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Eight Banners system have to be mentioned. Secondly, after the patriarchal clan system, ethical principles seeped to the Suolun Eight Banners, how to promote the change of its social organization structure. Finally, the analysis of the impact of the traditional social structure changes on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of Suolun Banner will be addressed.

Key words: Hulunbuir area; social structure; patriarchal ethics; shaman cultur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冰洋研究.第七辑/曲枫主编.—上海:上海
三联书店,2024.2

ISBN 978-7-5426-8347-2

I. ①北… II. ①曲… III. ①北冰洋-区域-丛刊
IV. ①D5-55

中国国家版本馆 CIP 数据核字(2024)第 001819 号

北冰洋研究(第七辑)

主 编 / 曲 枫

责任编辑 / 郑秀艳

装帧设计 / 一本好书

监 制 / 姚 军

责任校对 / 王凌霄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0041)中国上海市静安区威海路 755 号 30 楼

邮 箱 / sdxsanlian@sina.com

联系电话 / 编辑部: 021-22895517

发行部: 021-22895559

印 刷 / 上海惠敦印务科技有限公司

版 次 / 2024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2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710mm×1000mm 1/16

字 数 / 350 千字

印 张 / 21

书 号 / ISBN 978-7-5426-8347-2/D·616

定 价 / 88.00 元

敬启读者,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 021-63779028